

当前位置: 首页>期刊文章

[【小中大】](#) [【打印】](#) [【关闭窗口】](#) [【PDF版查看】](#)

转载需注明出处

学术沙龙

理论与实践：古典的与现代的政治理想主义

观 溟

科学文化评论

一 古典的政治理想主义

我们的时代据说是一个政治理想主义不再激起共鸣的时代。但是，只要我们稍微认真地想一想叫做政治的东西，就会发现，不论在哪个时代，理想主义对于政治生活都是不可或缺的，赋予政治生活尊严的东西正是，也只能是其理想。

从政治哲学的视野看，最早的政治理想主义是由柏拉图（427—347BC）表述的，“理想主义”这个词，在现在大家都还能够理解的意义上，正是根源于柏拉图。

谁都不会否认，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了关于“最好政治”的理想，就是“哲学家一王”的统治。不过，柏拉图从来没有像现在的哲学家这样写过论文或专著，只写了包括《理想国》在内的35篇戏剧性对话，从来没有说对话录中人物的话就是他自己的观点。所以，为了理解柏拉图的政治理想主义，我们首先不得不面对的是：柏拉图让其笔下的人物表述那些理想，意图何在？换句话说，柏拉图对其笔下人物所述理想的态度如何？

柏拉图的众多对话仿佛构成一个小宇宙，它是对（包含各种异质存在的）整体宇宙的再现或模仿。每篇对话都处理一个部分，揭示部分的真理，每篇对话于是必然依据主题的不同，采用一种特定的抽象方式，常常还不得不抽掉对于那一主题至关重要的东西。主导每一篇对话的抽象，就是该对话的主要特征。

《理想国》是唯一一篇由苏格拉底自己讲述的、被迫进行的对话。苏格拉底对未知的听众讲道，他和柏拉图的兄弟格劳孔下到比雷埃夫斯港，被一些朋友半威胁半劝诱地留下来。哲学家全部的武器就是言辞，苏格拉底本不愿屈从强力的威胁，但朋友们回答说，“若我们就不听，你们如何能说服我们呢？”于是苏格拉底被迫留下，这就是这场对话的起因。但是，当对话进入实质性的讨论，在苏格拉底和朋友们组成的言语共同体中，所有的强力便悄悄隐退了，苏格拉底凭他的言语成了这个言语共同体的真正主宰。

对话是在年迈、富有、虔诚的侨民克法洛斯家里进行的，苏格拉底和克法洛斯的寒暄引出了对话的主题：“什么是正义”。当苏格拉底开始哲学家的诘问，克法洛斯便起身离开，笑着去祭祀了。虔诚让位给了哲学，神圣之物也从这言语共同体中隐退。

苏格拉底和克法洛斯之子继续讨论，不多时，血气极盛的雄辩家色拉叙马霍斯打断他们。色拉叙马霍斯猛烈攻击苏格拉底，但是，苏格拉底没有费多大功夫就驯服了色拉叙马霍斯：血气丧失了自身的、独立的力量，转而与哲学的理智结盟。

这就是《理想国》第一卷所描述的故事，在这基础上，苏格拉底与格老孔兄弟才接下来讨论如何建立完美城邦。我们发现，这一基础的本质就是抽象，通过柏拉图的妙笔，强力对于言辞的优势、神圣之物对于城邦的不可或缺、血气对于理智的独立性，都被一一抽掉了。柏拉图生动地揭示出：如果强力未必不服从言辞的论证，如果神圣之物并非是城邦中绝对不可缺少的东西，如果血气总是与理智结盟，那么，城邦就能建立在哲学的基础之上[伯纳德特 2002，页565—566]。但是，实际上，一旦离开理论回到现实的政治实践，所有这些条件便都不会满足；在政治的实践中，所有这些被抽象掉的东西，都必须面对，一个不能少。

苏格拉底与格劳孔兄弟建立“言语中的城邦”，基于一个更重要的抽象。整个论证的前提是，他们设定在个体之人与城邦之间存在着平行关系，一个秩序井然的城邦就跟一个举止得体的人一样。但是，我们又发现，个人与城邦的平行关系马上就被个体灵魂与城邦的平行关系所取代；身体，连同身体的需要与爱欲（eros）被默默地抽掉了。对话从午后至少进行到第二天早上，原本说好了的晚餐连一个字也没有提到；年迈的主人在交谈中一上来说是，人老啦，对爱欲避之唯恐不及啦；在讨论城邦的需要时，苏格拉底缄口不提生育的需要；对身体爱欲的贬抑，首尾一贯……问题在于：若没有这一抽象，理论便不能根据灵魂的正义秩序建立起城邦的正义秩序，而有了这一抽象，城邦正义秩序的建立便又仅仅是理论上的。

理论（theoria）和实践（praxis），是对立的，这是柏拉图政治哲学的一个基本的洞见，也是古典政治哲学基本的洞见。（虽然有

程度上的不同，亚里士多德同柏拉图一样坚持两者的对立，并第一次明确论述了这对立。）这个洞见和如下洞见连在一起：对人类（政治）事务的完满解决，仅仅存在于理论之中。正是上述洞见，决定了古典政治理想主义的根本特征：古典政治理想主义本质上具有非革命的品质，因为，最好的城邦存在于言语之中。

古典政治哲学认为理论上的完美政治绝对不可能实现吗？也不是，并非绝不可能，不过那需要机遇，要靠命运之神的佐助。

我们生活在现代信念的洞穴中，一定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既然理论提出的理想并非本身就应该成为现实、能够成为现实，这种理想有什么用呢？有什么意义呢？

理想高于现实。

二 例证：古典政治理想之用

有一个例子或可用来说明理论的理想对于实践的用处。

曾经有段时间，在奥地利，列车经常晚点。有一次，有名乘客实在忍无可忍，指着列车时刻表对列车员大声抱怨，既然你们从来没有正点过，贴张时刻表在这有什么用呢？列车员一愣，继而微笑着答道，没有这张表，你怎么能知道我们晚点了呢？

这个例子既恰当又不恰当。

同列车时刻表一样，理想确实似乎是个标准，有了它，我们于是可以说一个政治社会是好还是不好。

但是，鉴于理论与实践的对立，理想并不直接提供一个政治实践为之奋斗的目标，理想甚至不是一个政治实践可以无穷接近但永远不能达到的目标。列车时刻表是一个标准，按时刻表运行是列车应该达到、也可能达到的目标。列车的运行是一个我们人类有办法控制的物理运动，我们有办法让整个运行的过程就像处于一个经典物理学的巨大实验室中，实际上，现代的高科技和管理已经可以让列车几乎完全正点运行了，给偶然、机运留下的空间极小极小。与此相反，在理论上、在言语中建立的理想城邦，由于它的抽象原则，则不可能、也不应该成为现实政治实践的目标，因为人类政治社会绝不可能类似一个经典物理学的大实验室。

我们不能将一个只在理论上可能的理想付诸现实，古典的政治理想主义明白这样一个简单的真理。有天堂，但天堂存在于天上，人间的天堂，那是人自己不能完成的任务，除非上帝想要。

三 现代的政治理想主义

现代的政治理想主义在伟大的文艺复兴运动之后兴起，从政治理论上说，开始于马基雅维里（1469—1527），就是那个据说在政治上主张“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哲人，但他本人绝不是个坏人，他在政治上是个爱国主义者，在道德上是个高尚的人。当然，现代政治变得这么糟糕跟他的教义不无关系。

马基雅维里批评古典政治哲学家只知道幻想“那些从来没有人见过，或者知道在实际上存在过的共和国和君主国”，认为他们不知道“人们实际上怎样生活同人们应当怎样生活，其距离是如此之大”。经过文艺复兴的解放，于是马基雅维里能够第一次试想把人的现实放理想之上，让实践高于理论。如果仍然按照传统的说法认为理论毕竟高于实践的话，那就必须提出一种全新的理论、一种全新的理想。这新理论不是像古典思想家那样抽象地、理论地构想（或者说幻想）完美政治，而要研究实际政治的本性；不是把目光放在人应该怎样生活，而是盯准人实际怎样生活。马基雅维里的逻辑很有意思：通过认识实际政治之道，为政治生活提供指导，为政治实践提供切实可行的理想或目标。马基雅维里把自己比做思想领域的哥伦布，他让政治挣脱了那些古典幻想的束缚，有了真正属于政治自己的陆地，一句话，政治的理想或目的就是政治本身。

马基雅维里是一个卓越的政治家，在政治实践中深切地感受过命运之神的“伟大与无情”，但是，为了他的新理想，他还是庄严宣布，命运之神是个女人，等着我们去击倒她、征服她。文艺复兴的解放何其伟大！我们要全靠我们自己，解决政治实践提出的问题，让理想成为现实。

新理想就是要确保成为现实，这得靠新理论来保证。霍布斯（1588-1679）第一个成体系地给出了新理论。为了给政治生活提供新风尚与新秩序，新理论虽然眼盯实际政治生活，但并非是对实际政治生活经验的概括和总结。同古典政治哲学一样，在逻辑上说，理论地建立城邦秩序，有赖于灵魂秩序的建立，因此，新理论的基础是一种新的灵魂学，即关于人的本性的新观点。古典理论通过抽象来研究灵魂，于是获得的只是关于灵魂的部分真理，这进一步决定了古典政治理想的品质。新理论则依靠还原，寻找政治生活的最具有普遍性也最有力量的根源。这种最普遍的根源，必定以某种方式是超政治的，它存在于人最基本的、非政治的生活中。与古典传统认定人天生是政治的动物不同，新理论否认这一点，认定人本来是非政治、非社会的动物。古典的对“天生的”“公共秩序”的经验消失了，霍布斯发现，对“私人世界”的经验可以还原为单个人生命中的种种激情，这经验中唯一真实的东西，如果说还是要有“公共秩序”，那么激情便是重建公共秩序的唯一要素，秩序只能是激情的个体之间的契约。推动激情个体去订立契约的是那压倒一切的激情，即“对暴死的恐惧”，这一激情让人们不得不心甘情愿放弃其他激情的完全满足。与古典传统不同，推动人们去建立秩序的东西不再是“公共秩序”或“至善”，完全相反，它就是“至恶”，因为唯一真实的世界，就是个体的噩梦世界。这就是霍布斯的新灵魂学。这种新灵魂学与柏拉图的灵魂学不同，它所看重的东西，在柏拉图灵魂学中，地位最低。在《理想国》讨论政治堕落的最低点时，柏拉图把僭主的生活展示为“欲望之梦”的实现，霍布斯当作唯一真实的噩梦世界，就起源于这欲望之梦。正因为如此，尼采说各种现代理想起源于奴隶造反，把低贱反过来当作高贵。

总之，为了保证新理想能够实现，除了要有做命运之神的主人的气概，还必须把理想降得低一些，再低一些，直至可以说，生命的理想或目的就是生命本身。让政治就从这里获得其尊严吧！？

现代的政治理想主义，于是便以这种方式（当然还有其他方式）为葬送政治理想主义作好了准备。

四 结语：政治尊严的来源或政治的界限

理论所提供的理想关涉到政治生活或实践的尊严。“政治生活的尊严源于某种超越政治生活的东西。可以有三种不同的方式来理解政治的本质界限。按照苏格拉底，政治把自己的尊严归于其上的超政治的东西，乃是哲学，或者说理论（*theoria*）；但这只有他所谓的具有良好自然本性、拥有特定自然资质的人才可达到。按照天启教诲，超政治的东西通过信仰达到，信仰并不依赖特殊的自然前提，而只是依赖神圣恩典或者上帝的自由拣选。按照自由主义，超政治的东西在于所有人在同等程度上占有的东西。自由主义